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求和性质辨析

徐振岐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摘要] 七七事变前, 蒋介石为争取时间整顿防务和寻求外援, 竭力维持中日间的和平状态。他的对日求和言论和举动虽有损于国家利益, 也不利于国内力量整合, 但在性质上与对日投降终究是不同的。

[关键词] 蒋介石; 中日关系; 求和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78X(2010)02 - 0033 - 03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蚕食, 蒋介石的应对之策不是应战, 而是求和。蒋介石对日求和促使日本侵略野心膨胀, 也不利于国内抗日力量的团结, 但在性质上与对日投降是不同的。本文对蒋介石对日求和的性质和意图加以探讨, 以期深化对蒋介石对日外交思想和政策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东北的沦陷, 中国国内包括国民党内部, 都有一部分人主张对日本“绝交宣战”。陈诚在 9 月 24 日曾致电蒋介石, 要求“明令对日宣战”, 认为“兹如举全力对帝国主义者宣战, 势必振聋起聩, 军民一致, 人人有必死之心, 视第一次北伐之叱咤风云, 有过之而无不及。纵不幸而败, 亦可表示我民族不屈之精神于世界, 人心不死, 何难复兴。”^[1]但是, 对日宣战的呼声却未得到蒋介石的响应。相反, 他极力压制民众或其他政治势力自发的抗日运动, 认为:“今我明明尚无战之实力, 而贸然为暴日所不敢为之绝交宣战, 则适予暴日加责任于我之机会, 而益得以恣行无忌矣。”^[2]

为掌握日本方面的政策动态, 并表示中国方面的和平意愿, 蒋介石曾积极与日本军政界人士进行交往。其 1933 年 1 月 27 日日记载:“西园寺派其秘书与雨岩联络, 称日本内阁将有变动, 其政权勿操于少壮军阀之手, 以期中日接近, 嘱为转达。”^[3]10 月 24 日日记载:“本日与荒木使者古谷谈话, 告其东亚事应归东亚人自决, 中国事亦应归中国人自决, 尤须注重于东方之文化哲学与伦理来求解决之道, 凡一切政策, 当在其人, 若有良好之政策而无人执行则政策等于乌有并历指日本对华政策所遇之非人致贻今日东亚之患也。”^[4]

但是, 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并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 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 还占据了热河, 进而企图染指华北。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 蒋介石还是采取了隐忍的态度。1934 年 12 月 20 日, 他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敌乎? 友乎? ——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 用检讨的态度表明他对中日问题的看法。他希望日本“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 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合作, 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之以互利的经济提携, 应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 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结合。”他强调中日两国犹如“唇齿辅车”, 要求日方“悬崖勒马”, “谋及久远的和平”。^[4]1935 年 11 月 9 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外关系报告, 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决不放弃和平;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亦决不轻言牺牲”, 并表示“抱最后牺牲之决心, 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5]

蒋介石对日求和的言论和举动无疑有损于国家利益, 但在性质上与对日投降还是有区别的。

其一, 他避免与日本签订丧土之约。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曾告诫张学良, “东省版图, 必须完整, 切勿单独交涉, 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6]1932 年初他在演讲中亦指出:“决不为丧权辱国之签字, 使暴日在东北侵略之权利, 始终为盗劫之行为, 无任何法律上之根据”。^[2]此后, 在日本的压迫面前, 国民政府还是与日

[收稿日期] 2009 - 11 - 21

[作者简介] 徐振岐(1977 -), 男, 黑龙江双鸭山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

本达成了妥协，如签订《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和《塘沽协定》，但蒋介石强调它们“纯粹是军事的性质”。^[7]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则指出：“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8]在蒋介石看来，不断送领土主权就是对日外交的底线。

其二，他不完全放弃对日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蒋介石也于1月30日发出通电，号召全体将士“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9]2月初，他又令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开赴前线。然而，蒋介石并未真正决心和日本全面作战。2月13日，他与何应钦研究决定：十九路军已获胜十余日，“趁此收手，避免在与决战”。^[10]此后在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中，蒋介石都采取了有限抵抗的政策。他认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长期不断地抵抗”，“越是持久，越是胜利”。^[11]这也就是蒋介石所谓的“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表明“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4]蒋介石反对孤注一掷的作战方法，想通过外交、军事等手段的持久周旋，使日本知难而退，以获取和平。正如他在1937年7月1日日记中所云：“中国应具必战之决心而后可以免战，必如是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12]

二

蒋介石的“和日”外交努力反映出他争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有其幻想的一面。但在日本的进逼面前，蒋介石也并非不清楚日本的侵略本质。其1935年2月24日日记云：“是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其最后则在统制文化，制我民族生命也”。^[13]实际上，蒋介石更多地是把对日求和作为实现其对内对外战略的策略手段。通过对日求和，他主要希望达到两方面的目的：

其一，为抗战准备争取时间。

由于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前景不甚乐观：“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不能咄咄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2]因此，他极力强调对日备战的必要性，在1933年2月6日的日记中云：“滞延时日，乃为我之上策；但不能不急急准备”。^[11]

一方面，蒋介石希望通过对日求和为抗战军事和经济准备争取时间。《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于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湔雪此耻乎！”^[11]为应对日本侵略，蒋介石从多方面加强了备战：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稳固国家经济；规划国防工业和国防工事，奠定长期抗战基础；强化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控制和建设，确定并稳固抗战后方。

另一方面，蒋介石希望通过对日求和为利用国际矛盾、寻求外来援助争取时间。蒋介石认为，中国是各国的公共殖民地，日本“将中国来做他的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先要同世界各国来决战”。因此，他认定日本“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要吞并中国，就得“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14]因而他力图避免与日本先行开战，而是希望趁日本与列强开战之机谋得国家的独立。蒋介石认为日苏矛盾尤为深刻，其1932年5月6日日记云：“晚与罗梅谈外交事，俄日战争或不能免，吾国急应运用，但以中立为原则，然必欲有中立之资格也，故准备不可不速”。^[3]1933年2月6日日记云：“倭之目的敌，作战准备皆在苏俄，如果倭果与我真面目作战，迁延时日，则倭与原定目的错误，是其立于被动地位，倭果如此，则余之延滞时间，是所欲也。但仍不能不急急准备，如果其于上年不来真攻，则余计定矣”。^[3]他在华北事变的危机面前仍在一些问题上对日妥协，原因之一即在于强化苏日矛盾。其1935年11月7日日记云：“倭寇逼余撤消军分会，甲使俄国紧张，乙如欲促成倭俄战机，我中央在华北势力应撤退”。^[13]蒋介石在利用国际矛盾的同时，也在极力寻求外界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为中国抗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二，便于实现其消除异己的企图。

在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时，中国正处于分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抗日充满忧虑，他在1931年11月30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15]蒋介石所谓的“安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

内容：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共武装，消弭中共的内在威胁，确保国民党政权；其次是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统一力量，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蒋介石把安内的重点放在“剿共”上，认为“剿共”是“攘外”的先决条件，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前而谋求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16]

在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举动引起国内越来越多的不满和反对声浪，终于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但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在试图寻机实现其治下的统一目标。1937年2月5日他在检讨国是时指出：“避免内战，设遇内战，则全力救平之，以尽安内攘外之责”；“政治军事之整顿，采由近及远之渐进步骤，期三至五年内，以竟统一之功”。^[12]

三

从蒋介石对日外交思想和政策来看，他的对日求和实质上属于策略性质，与对日投降是有本质区别的，也不宜将之简单地归结为对日妥协。实际上，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在妥协与对抗之间徘徊，包含了和与战两个方面的取向。影响蒋介石对日政策取向的根本因素在于其对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的权衡：他仍然把政权利益，包括其个人的政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因而把安内作为攘外的前提；他同时也希望在不触动政权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兼顾国家利益，因而力图以求和掩护备战。这种举动无疑不利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尽早形成，使国家和民族利益蒙受诸多不必要的损失。

[参考文献]

- [1]陈诚. 电呈请速明令对日宣战[M]//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62.
- [2]蒋介石. 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M].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318,320.
- [3]黄自进. 蒋介石日记的启发:以19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日关系为中心[M]. 开拓或窄化?:蒋介石日记与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2008:39,39,32,32.
- [4]蒋介石. 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M]//章伯锋,庄建平. 抗日战争:第一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553,558-559.
- [5]蒋介石. 对外关系之报告[M]//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921.
- [6]蒋介石. 蒋主席日记一则[M]//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287.
- [7]蒋介石. 蒋委员长对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与学生代表讲:政府与人民救国之要道[M]//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744.
- [8]蒋介石. 御侮之限度[M]//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952.
- [9]蒋介石. 蒋介石告全体将士电[M]//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435.
- [10]罗文干,何应钦等转告蒋介石指示蔡廷锴等电[M]. 章伯锋,庄建平. 抗日战争:第一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346.
- [11]古屋奎二. 蒋介石秘录:第三册[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77,254,292.
- [1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63,14.
- [13]吕芳上. 从日记及档案中观察蒋介石对日外交策略(1930's~1940's)[R]. 2003年度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日台交流・ンター历史研究者交流事业报告书.
- [14]蒋介石.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M]//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793.
- [15]蒋介石. 外交为无形之战争[M]//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577.
- [16]蒋介石. 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M]//蒋总统集:第一册,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662.

The Nature of Chiang Kai - shek's Seeking Peace with Japan before the July 7 Incident

XU Zhen - qi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July 7 Incident ,Chiang Kai - shek tried to maintain the peaceful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order to strive for more time for consolidating defense matters and seeking foreign aid. His speech and act of seeking peace with Japan is harmful to national interest ,and is unfavorable for harmony of domestic strength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surrendering to Japan in nature .

Key words :Chiang Kai - shek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eeking peace